

在驚濤駭浪中的一年

張希哲

服務中央宣傳部回憶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應程天放先生之邀，進入中央宣傳部服務，至三十九年三月離職，為時一年。這一年間，正值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我因參與宣傳部工作，更深切體會到當年先總統蔣公領導國民黨幹部挽救國家民族的苦心孤詣。茲就我所親歷或知道的，將中央宣傳部在這驚濤駭浪一年中的奮鬥歷程，寫下點滴，也許可為建國七十年史料，添些註解。

一、危疑震撼的一年

蔣總統經國先生在所著「負重致遠」一書，對於國家在民國三十八年的處境，有這樣的記述：「民國三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共匪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全疆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為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匪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引自「負重致遠」第四十五頁）。先總統蔣公是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並依憲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由李副總統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蔣公引退後，國家失了強固的領導中心，陷於更大的動盪不安。李宗仁謀和心切，於一月廿

四日以代總統名義令行政院取銷全國戒嚴令、解除報章雜誌禁令、釋放政治犯、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又於廿七日致電共僑毛澤東，承認以毛僑所提「和談八條件」作為談判基礎。由於李代總統領導無方，舉措失常，遂使全國民心士氣鬥志消沉，戰事節節失利，全國各大城市，陸續於三十八年下列時間陷入共軍手中：

北平——一月三十一日，南京——四月廿三日，太原——四月廿五日，武漢——五月十五日，西安——五月二十日，上海——五月廿七日，青島——六月三日，南昌——七月廿一日，福州——八月十七日，蘭州——八月廿七日，西寧——九月三日，衡陽——十月八日，廣州——十月十四日，貴陽——十一月十五日，桂林——十一月廿三日，重慶——十一月三十日，成都——十二月廿六日。

全國的政治中心，因受戰局的影響，在這一年間亦一再播遷：蔣公引退未久，國民黨中央黨部及行政院先後於二月一日及五日遷設廣州。後因李代總統在南京，立法院亦在南京集會，行政院部份高級人員乃遷回南京；至南京撤守，中央政府各機關於四月廿五日起均在廣州辦公。約四個月後，廣州外圍受匪軍威脅，中央機關於九月初向重慶疏遷，十月十五日起在重慶辦公。一個多月後，行政院於十一月廿九日再遷成都，其他機關則陸續遷至台北。至十二月九日，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均開始在台北辦公。

總之，民國三十八年這一年間，國家民族的命脈，已臨存亡續絕關頭，全國同胞無日不是處於驚濤駭浪、焦慮惶惑的情勢中。國民黨在蔣總裁領導下，仍本著革命精神，為挽救國家民族而努力奮鬥。

二、健全組織、加強聯繫

國民黨中央黨部各單位自南京遷到廣州，機構、人員和經費都一再緊縮，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只有二十多人。三月二十三日何應欽先生出任行政院長，中央常會決定由程天放先生繼任行政院秘書長，中央常會決定由程天放先生繼任。程先生就任前幾天約我談話，希望我到宣傳部幫忙。我正擬想出若干理由來婉謝他的好意，他却先誇獎我一番，說我在廣東工作多年，曾任廣東省黨部宣傳科長、國民通訊社社長，和廣州日報社長，對宣傳工作有經驗，對當地文化新聞界情形熟悉，他要找的人，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接着又責以大義，說我是政校學生，總裁培植的子弟，當黨國危難的時候，不能規避責任。經他以大義相責，我想好的理由不便再說，只好答應再過幾天和他研究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

在接任前，程天放先生和我多次商討，我們認為要積極開展工作，應特別重視下列幾項因素，也就是要設法克服的一些困難：(1)雖然「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李代總統及部份高級官員仍然傾心謀和，一般民眾對和平亦存在着幻想，

在「和談」尚未絕望時，在宣傳方針上不宜正面反對「和談」，但是不得不積極設法鼓舞反共鬥爭的意志。(2)李代總統已令行政院取消全國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准許被罰停刊的報紙雜誌復刊，各種形式的匪諜紛紛出籠，紛歧龐雜的言論陸續浮現。(3)香港是中共匪幫及尾巴黨派陰謀活動及反動宣傳的主要據點，而當時香港和廣州交通頻繁，旅客可以自由往來，香港出版的報紙雜誌亦可自由運銷廣州。(4)一部黨報、黨營文化事業，及地方宣傳機構與宣傳部聯絡中斷，另有少數機構可能已被親共份子滲透，對中央的態度是若即若離。(5)中央社及新聞局的駐外單位，因欠發經費及裁減人員關係，有一部份的業務瀕於停頓。針對着上述因素，我們研商了幾項計劃，並約部中同仁共同討論決定。其中需先着手進行的是健全組織及加強與宣傳文化新聞機構的聯繫。

中央宣傳部在南京時，部內設有七、八個單位，遷到廣州時，已裁併為兩個處。程先生接任後，將兩個處分設為四個處，並酌增工作同志數人，第一處掌理宣傳計劃及聯繫輔導，第二處掌理編審出版，第三處管理黨營文化、新聞事業，第四處辦理部內的總務工作；分別由我和宋念慈、張育德、屠義方等擔任處長，陳天鵬、高蔭祖兩人繼續擔任秘書。原來的兩位副部長：陶希聖先生繼續留任，另一任李俊龍滯留北平，中央常會決定以任卓宣先生繼任。

蔣公引退前，中央設有一個宣傳指導小組，參加者為黨、政、軍方面負責宣傳、文化、新聞的主管同志。它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但對於宣傳決策及協調聯繫却發揮很大的功能。原由陳布雷先生任召集人，陳先生去世後，由宣傳部長黃少谷先生任召集人，從檔案中看到當時（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一月）經常參加這小組會議的有：張道藩、陳雪屏、谷正鼎、彭昭賢、陶希聖、李俊龍、陳博生、沈昌煥、唐縱、曾虛白、馬

星野、鄧友德、吳道一諸先生。這小組自蔣公引退後，曾於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三十八次會議，此後即因中樞播遷而停頓。程部長接事後，我向他建議恢復宣傳指導小組的組織或設立一個類似的機構，他認為另行成立一個委員會較好，於是乃草擬規程，提經中央常會通過，成立中央宣傳委員會，由宣傳部長兼主委，經常參加委員會的有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新聞局長（後來改為新聞處）、中央非常委員會秘書長（後來增加）、國防部新聞局長、中央海外部部長、外交部情報司長、宣傳部副部長及黨營宣傳單位首長（如中央社社長）等，每月舉行會議兩次，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秘書業務由宣傳部第一處兼辦。這一時期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其功能及參加人員和以前的宣傳指導小組相似，不過組織較為制度化而已。重整組織的同時，宣傳部迅速與各地宣傳文化單位加強聯繫。廣州地區的報紙、雜誌、通訊社、廣播電台等負責人及記者，由部長舉行了幾次聯誼性的聚會，其餘時間經常由我和他們聯絡，一方面由於職責的關係，另一方面亦由於部內高級人員講廣東話的只有我一人。這項聯絡工作，我一直做到自廣州撤退前一天。對於各地黨營文化及宣傳單位，則透過電訊總台和中央社電訊的傳達與他們取得聯繫，未受戰事影響的地區，經常提供宣傳要點一輔導其加強工作，如需遷移的單位，則請國防部新聞局轉洽當地的軍事機關給予支援或協助。」

三、宣傳下鄉

三十八年五月下旬，杭州、武漢、西安相繼撤守，上海戰事激烈，華南形勢緊張。我認為中央黨部及省黨部的工作，應深入基層，喚起民眾認清共匪的面目，加強反共鬥志；並切實組織民眾，負起自衛保鄉的責任，乃草擬了一個「宣傳下鄉」的計劃向程部長建議。他看了之後，十分

贊同，不久便會同中央組織部向中央常會提出籌組工作團的計劃。中央決定先組織第一工作團，從廣東開始工作；並推劉文島先生擔任團長，團員有組織部朱耀祖、青年部梁興義、農工部方樞、監察會胡光炳、黨員通訊局蔣海濤諸先生。我們要推我擔任副團長，我不敢接受，只以團員名義執行秘書職務。廣東省黨部為了配合這項計劃，也組織了一個省工作團，由謝書記長鶴年任團長，和我們一起工作。從六月十四日起，以二十多天時間，遍訪廣州市及附近幾縣的鄉鎮。

我們在出發之前，商定幾項工作原則：(1)盡可能深入基層，接近民眾；(2)以鼓舞代替督導，以傾聽羣衆意見代替檢查工作；(3)盡量了解問題，能解決的隨時協調解決，不能解決的負責轉達；(4)以多同情少責難的方法提高幹部工作情緒。我們每到一個鄉鎮，均以闡明為什麼要反共及爭取民眾對中央的信仰和向心為主旨，而運用座談會、民眾大會、工作檢討會或個別訪問等不同方式來達到我們的目的，最後歸結到加強基層工作，組織「自衛保鄉隊」或「黨員行動隊」等具體行動。我們的辛勤奔波，雖不敢自誇有很大的成就，但至少對廣州市及鄰近南海、番禺各縣的幹部和民眾，已堅定了他們反共的立場，激發了他們保鄉的鬥志。

四、加強國外宣傳工作

國際宣傳工作是行政院新聞局的職掌，對海外僑報的輔導是僑務委員會的職掌，對海外黨報的管理是中央海外部的職掌。不過處於非常時期的管理，而第一處承辦宣委會秘書業務，因得參與這幾方面的籌劃工作。就我所知，當時曾擬訂幾個加強國外宣傳計劃，先後提經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並報中常會核備。其中較重要的兩案，內容如下：

(一)加強對美宣傳工作：建議中央及從政主管同志將有限的國際宣傳經費集中使用，重點放在美國，積極開展工作，冀能改變美國朝野人士的觀念而增加對我援助。具體的措施為：(1)將行政院新聞局若干駐外單位裁減後的人員經費集中於美國使用。(2)加強中央社在美業務，除採訪工作外，應收聽總社的新聞廣播，迅速在當地發稿，供應當地報刊、廣播機構及華僑報紙參考。(3)增加駐美使領館的新聞人員及經費，多方面推動工作。(4)選邀美國新聞記者來華採訪。這些計劃大部份均已實施，惟因經費所限，未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二)加強香港宣傳工作：計劃目標是以香港為亞洲國際宣傳據點，同時亦為對東南亞華僑的傳播中心。計劃重點是協助天津民國日報、北平華北日報，及上海中央日報撤退的人員和器材，與香港的國民日報合併改組，出版一份規模較大的報紙，不祇以銷行香港為目標，還要在廣東及東南亞各地銷行。這份報紙原擬取名為民主論壇報，後來改定為「香港時報」，於三十八年八月四日創刊。此外還計劃在港以私人企業方式創辦英文晚報及中文雜誌，並組織出版公司，編印中英文書刊，供應海外各地。這些計劃，惜因經費關係，未能全部實現。

五、對「中美關係白皮書」的評論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公布「中美關係白皮書」。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一件大事，而在宣傳部當年的業務方面亦是一件大事。在廣州的新聞界朋友，從電訊中看到一些報導之後，紛紛找我討論這事，我當時不能不表示意見，但又不便表示過於具體及激烈的意見。我請示天放先生之後，先和他們聚會了幾次，談談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白皮書所引用的材料，多數為

美國駐華外交軍事人員及商人所提的報告，而這些人員中早有共黨及親共份子的滲透；美國國務院根據這類偏見的報告接轉起來作為中美關係的文獻來發表，目的是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而引起中國大陸的危機作辯護，中國人民自然可以且亦應該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予以批評。不過，「白皮書」的發表，只是國務院一部份官員的做法，美國朝野中，仍不乏正義有識之士；為了改善中美未來關係，我們對於「白皮書」不能不評論，但不宜作叫囂譴罵式的評論，而應該引證事實來辯正他們的誤解與偏見；並對他們作善意的忠告。

過了幾天，程部長奉 總裁蔣公電召赴台北研商「白皮書」有關問題，同時我已向外交部取到「白皮書」全文趕緊和朋友們研究。程部長返回廣州不久，宣傳部向新聞界及宣傳單位提供了一份參考文件，其主要論點如下：

甲、「白皮書」對中國問題及中美關係有不少誤解與錯覺，最顯著的如：

(一)白皮書只辯護雅爾達會議關於東北秘密條款的訂立，而忘却美國政府對於蘇俄破壞此項條款、利用中共奪取東北、將東北土地、人民與資源關入鐵幕之行為，從未與中國政府共商有效辦法予以防制，實負有不應推諉的道義責任。

(二)艾契遜在其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件中說：若共黨政權輔助蘇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鄰邦，美國當予積極抵抗。這是美國未認清共產政權的本質。美國放棄中國是失敗主義的表現，綏靖政府恰足以招致更慘烈的戰爭。

(三)艾契遜一面主張放棄援助中國政府，一面又期待並擬鼓勵新領導力量的產生。這種論調，倘非故意歪曲事實作為推諉責任的藉口，即為一種空虛的幻想。

(四)中共佔領區內，中國人民怨聲載道，美國早已獲得甚多之情報，但白皮書並無隻字提及。相反地，却盡量引述過去中國人民對我政府的各

種批評，斷章取義，誇大其詞，顯非公允。

乙、「白皮書」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或是「以偏概全」，或係根據親共份子之報告，很多地方均欠客觀公正，其中且有不少誣蔑之處，對中美兩國傳統友誼，有重大損害。如下列事例，甚為明顯：

(一)中國以積弱之國家，革命尚未成功，即從事長期抗日戰爭；而抗戰結束以後，又遭受中共武裝叛亂之破壞，以致生產衰退，通貨膨脹，政府官吏之行政效率與軍隊官兵之士氣，自不免受其影響。但白皮書竟指一部分之文武官吏之個別行為為一般政治現象，而認定整個中國政府貪污無能，此種宣傳，對於我抗戰迄今十數年來，無數茹苦含辛潔身自愛之高級中級下級公務人員，實是一種侮辱。

(二)白皮書批評中國政府不接受美方建議，不從事政治改革。但事實可以證此種批評之失當。

(1)抗戰結束以後，中國政府明知中共不願放棄其武裝叛亂政策，而實際上武裝叛亂日益發展，更明知和談授予中共以擴張掠地之機會。行憲足以鬆弛政府全面動員之努力，但仍接受美方調解，進行和平商談。和平失敗以後，在中共大規模叛亂之情勢下，毅然實施憲政。中國政治、經濟改革，更受中共叛亂之牽制與破壞。未能一一收預期之實效，因此，吾人對於白皮書之批評，不能接受。

(2)美國軍事顧問團對於中國剿匪軍事雖偶有建議，但顧問團人員從無一人會親往前線觀察實況，其對於中國剿匪軍事之批評，所依據之材料，為中共之宣傳及親共或共產分子所作之報告，其批評自不切合剿匪軍事之實況。美方軍事人員建議之可行者，中國政府無不盡量採納實施，例如國防部之組織即係依據彼等之建議方案而調整。

丙、「白皮書」雖充滿了誤解、錯覺，及不當的批評，但亦有些少令人欣慰的地方，如：

(一)美國官方過去數年中，總以為中共為農村改革者，而非真正為馬克斯主義者，「白皮書」始明確認識中共為國際共產主義者，完全聽命於莫斯科。

(二)美國官方過去對於蘇聯之援助中共，每抱緘默或懷疑態度，「白皮書」始明確承認蘇聯直接間接援助中共。

(三)美國過去對於蘇聯破壞雅爾達及中蘇條約未肯明白指出其責任，「白皮書」始確切指出。

丁、對白皮書的評價：

(一)白皮書側重於美國政府過去對華政策之辯護，故其作用為消極的而非積極的，破壞性的而無建設性的，只將過去已歸失敗之對華政策之責任完全推諉於中國政府，而對於當前中國及亞洲所面臨之危機，並未提出積極有效的措施。此不獨為中國及遠東人民所不滿，亦為美國與其他西方人民所指責。

(二)美國政府依據其本國一部份人片面之意見，而對於其戰時盟友之政府及領袖遽然評定其功過是非，其態度之偏頗，不待多言而可知。

戊、對美國政府的期望：

(一)吾人並不隱諱中國政治上之缺失，而應有深切之反省，但美國政府對於其顯著錯誤並顯已失敗之對華政策，亦應同樣有深切之反省。美國政府尤應了解此種誇張與偏頗之批評，實足以打擊現正與國際共產主義作戰之官兵之士氣。今日太平洋諸國之迫切需要，為阻遏國際共產主義及其發展之有效政策，而非諉過卸責之評論。

(二)美國政府過去對華政策與中國政府剿匪政策，背道而馳，其主要原因，即在美雙方對於蘇聯與中共之關係，持有不同之意見，中國政府領袖本於廿五年來反共鬥爭之經驗，自始即看透中共為蘇聯在遠東膨脹之工具，絕非中國國內和平民主政黨，故其絕對不願與任何和平民主政黨相處。反之，美國政府認定中共為農民民主政黨

，並認為中國民主政治，必須中共參加政府始能實現。中美雙方政策之紛歧，乃為中共所乘，其結果漁人得利，而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剿匪戰爭同歸失敗。今後美國政府如能本於正確認識，而採取積極有效之步驟，以遏制國際共產主義在中國之發展，則時機仍不過晚。

當時多數報刊對「白皮書」的評論，大致係參考上述論點而發揮。

六、推展思想運動、提振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

民國三十八年六、七、八幾個月，政府及黨的領導中心，採取了好些積極的措施和做法，均足以激勵民心，鼓舞士氣；其中較著者，如：

(1)六月三日李代總統提名閻錫山先生為行政院長，立法院投票同意，十日明令發表朱家驊先生為副院長，谷正綱、葉公超、關吉玉、杭立武、張知本、嚴家淦、陳良、周昆田、戴愧生諸先生分任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蒙藏、僑務各部會首長，張羣、吳鐵城、陳立夫、黃少谷、萬鴻圖、王師曾、劉航琛諸先生為政務委員，閻院長兼任國防部長。

(2)七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在廣州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蔣總裁任主席，李代總統宗仁任副主席，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吳忠信、張羣、吳鐵城、朱家驊諸先生為委員，洪蘭友、程思遠先生分任秘書長、副秘書長。

(3)蔣總裁於七月十四日及八月二十三日兩度蒞廣州，籌劃東南政局並指導黨、政、軍幹部工作方針。七月二十七日李代總統飛台北，謁蔣總裁會商國家大計。

(4)七月七日蔣總裁領銜與各黨派領袖八十餘人聯名發表反共救國宣言。七月十日蔣總裁應邀抵菲律賓，與季里諾總統舉行碧瑤會議，次日發

表聯合宣言，號召遠東各國組織同盟，遏制共產主義擴張。八月六日，蔣總裁抵韓國，與李承晚總統商討遠東反共聯盟問題，於七日在鎮海會談，八日發表聯合聲明。

(5)七月二日政府頒布改革幣制命令，今後國幣以銀元為本位，並發行銀元券。(台灣省已於六月十五日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

(6)中央非常委員會於七月二十日通過「扭轉時局方案」，八月一日討論保衛華南、西北計劃，三日通過「反共救國方案」，由黨、政、軍各部門幹部分別執行。

(7)七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接受蔣總裁所提「本黨改造案」，隨將全案頒發各地黨部領導黨員鄭重研究，將意見彙送中央。(後來蔣總裁於九月二十日在重慶發表「為本黨改造告全體同志書」)。

對上述這幾件大事，宣傳部均配合時效，向新聞界及宣傳單位提供資料，或分析其背景、或闡釋其意義及影響，便有助於傳播，而使民眾增加了解。惟黨的改造案不僅是執政黨一件大事，也是加強反共鬥爭的重要措施。我們認為：黨的改造，以建立堅定信念，提振革命精神最為重要，因該案將由各級黨部領導黨員廣泛討論研究，宣傳部為使幹部及黨員增強認識，並以行動擴大影響，乃訂定「推展思想運動，加強理論鬥爭，促進精神動員方案」，提經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分發各級黨部、宣傳、文化、新聞單位，及有關從政從業主管同志參照推行，但未公開發表。

這方案的要旨如下：

甲、基本認識

一、當前反共戰爭失敗的因素固多，精神上的失敗是最主要的因素。由於黨員和民眾對反共戰爭沒有深切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有的且抱着悲觀失敗的心理，在精神上先做了敵人的俘虜，所以雖有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民，優良的軍力

和配備，不到兩年便由優勢轉為劣勢。今後要轉敗為勝，必須先展開思想運動，加強理論鬥爭，鞏固精神防線。

二、反共戰爭不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戰爭，而是全國人民為了保衛國家獨立、維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免受鬥爭奴役的戰爭。如在中國能遏止共產勢力的擴展，亦有助於亞洲乃至世界的安定與和平。

三、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數十年，對當前反共戰爭的勝敗，責無旁貸。國民黨要負起責任制敵致勝，應健全革命組織，重振革命精神。

乙、重要內容

一、思想運動的主要目標是以三民主義思想武裝黨、政、軍幹部的頭腦，並使全國民眾加深對三民主義的認識了解，共同努力實行。

二、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是：(1)民族主義——國家獨立自主；(2)民權主義——政治民主，人民享有自由；民生主義——經濟平等，和平建設均富的社會；這都是全國人民渴望達到的目標。但中共匪黨的主張和做法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在國際方面匪酋毛澤東於三十八年七月一日公開宣布向蘇俄「一面倒」政策；政治方面主張階級鬥爭，在共區施行清算、公審、恐怖的特務統治，根本談不到民主自由；經濟方面假財產公有為名，在共區以暴力沒收私有財產、壓榨農工勞動力，匪黨幹部成為新的剝削階級。大家為什麼要反共？我們如果不願像共匪佔領區的民眾一樣過悲慘地獄般的生活，就應該齊心合力反共。用什麼去反共？反共戰爭是多方面的，而以思想戰為根本。從上面的比較，得知三民主義理論是戰勝共產主義有利武器。

三、當前的反共戰爭，是反暴力反極權的社會戰爭，也是消耗性的長期戰爭；欲求戰爭的勝利，必須實施徹底的總動員。自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並公布「厲行全國

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後，按理全國已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但實際上，我們的反共戰爭却是沒有動員的戰爭，至少可以說是沒有全面動員的戰爭。就從本年（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和談「再度破裂廿三日國軍撤守南京之後，除了軍事部門之外，政治、經濟、文教各方面動員的程度如何？檢討起來，距離目標甚遠。故今後要強調全面總動員對反共戰爭的重要性；除了軍事動員之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亦應配合軍事作全面的動員；除了人力物力動員之外，精神動員尤為重要，如果精神失敗了，縱有優良的武器和廣大的兵源，亦難發揮制敵致勝的效能。

丙、實施辦法（由宣傳部按不同的對象分別以專函通知）

一、各級黨部策動幹部及黨員擴大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及本黨改造方案。

二、鼓勵文化、新聞界開會研討，著文闡釋，及擴大報導三民主義思想戰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理。

三、各級學校加強實施三民主義教育及反共教育。

四、黨、政、軍、文化宣傳單位大量編印出版三民主義及反共理論專著，並獎勵民間出版反共書刊。

五、廣播電台應將闡揚三民主義思想駁斥共黨謬論，及加強精神動員列為固定節目，並多報導有關思想運動之座談會、講演會的錄音。

六、聯絡文藝、美術、音樂、影劇各部門工作者，組成團體或工作隊，分別推展思想運動及精神動員。

七、文化宣傳工作盡可能由城市轉向軍隊和鄉村的基層，使廣大的民眾和官兵，建立起堅強的抗共精神防線。

七、在廣州、台北、昆明、重慶、美國同時展開工作

中央宣傳部於三十八年二月自南京遷設廣州，從這時起至十月初旬，都在廣州辦公。對各級黨部和各地黨營文化事業的聯絡、指導、管理，各種宣傳文件及書刊的分發，都在廣州辦理。在這一段時間裏，宣傳部工作雖集中於廣州，但其中有幾個月，宣傳部同仁，除了在廣州工作之外，也分別在台北、昆明、重慶和美國展開工作。

自從國軍退出京滬之後，蔣總裁在台灣的時間較多，陶副部長希聖先生在台北追隨。總裁工作，並就近指導台灣地區的宣傳文化業務。後來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在台北成立，台北便成為黨國大計的籌劃決策中心。所以有幾個月，宣傳部雖然設在廣州，但若干國家大事的宣傳指導原則是在台北商定的。如對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評論，總裁訪菲、訪韓的意義及有關總統復職問題的闡釋等，都是顯著的事例。

九月初，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在重慶晉謁蔣總裁回到昆明後，為了表明反共立場，於九月十日解散言論越軌的雲南省參議會，逮捕親共份子，查封反動報刊，並解散雲南大學。為了加強反共文化宣傳工作，盧漢電請總裁派高級人員前往昆明指導協助及作反共演講，總裁批交宣傳部。程部長接電後，商請任副部長前往，並希望他在雲南工作告一段落之後，轉往貴州四川兩省指導宣傳工作。任先生於九月下旬自廣州飛昆明，停留期間，據任先生自己憶述工作情形說：「我由廣州到昆明，拜會盧漢後，便開始演講。舉凡黨、政、軍、教等人員，全都分別講演了。這些人員處於各種單位中的，逐一往講。內容當然是反共，但不限於理論，要接觸實際。……每天

至少是上午下午兩次，每次兩小時。……『紀念國慶和雲南底任務』一文是在昆明寫的。』（引自「任卓宣評傳」四五頁）

在任副部長赴昆明的前幾天，程部長先啓程赴紐約代表我國出席聯合國第四屆大會（首席代表為蔣廷黻，另兩位代表為劉師舜、張彭春）。程先生在美三個月，除了協助蔣代表為我國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之外，並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檀香山等地進行國際宣傳，指導僑報，激勵僑胞支持祖國，亦即是宣傳部在國外要做的工作。在當年天放先生幾次給我的通信中，可以知道他幾個月在美工作的概略：(1)十一月廿三日函謂「控蘇案本週內至遲下星期一即可提出討論。放爲此事搜集資料，修改演詞（先後達三次之多）並不斷向代表團同仁打氣，又與各國代表聯絡，費時間金錢不少」。 (2)在紐約期間，曾多次應邀在僑團、僑校及美國大學演講，並與僑報負責人談話；其中以雙十節前夕華美協進社國慶聚會之情況最爲熱烈；十一月七日在紐約大學演講後，答復師生提出的問題達一小時多。(3)十二月中旬在美京一訪晤美國參眾兩院議員諾蘭等十餘人及白傑爾海軍中將（前駐青島美艦隊司令）、赫爾利將軍（前駐華大使）、詹森（前駐華大使）、霍恩百克、范伯思等人。當時華府援華空氣，頗爲熱烈；白傑爾且告放，正奉海軍部長指示，研究如何援助中國保衛台灣之計劃。(4)三十九年元月前後在芝加哥向僑團及黨員分別講演，一月五日向意里諾大學師生講中國共產黨之真面目，六日復應該校教授邀請餐會，報告中國問題及答復各人詢問共達三小時之久。(5)一月七日至十四日在舊金山，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西雅圖，二十日至廿六日在檀香山等處，工作情形大致與紐約芝加哥兩處相似。程部長在美工作四個月，於三十九年一月廿八日返抵台北。

十月初，衡陽、韶關相繼失守，廣州實施緊

急疏散。中央黨部與行政院決定遷重慶辦公。宣傳部因部長和兩位副部長均不在廣州，我和部同仁商議後決定：胡容民、吳幼康等幾位同志隨中央黨部赴渝辦公，其餘大部份同志及電訊總台分批遷台北。

任副部長於十月中旬自昆明到台北向總裁覆命，稍停數天，即遷飛重慶。到重慶後，「曾邀請文化界人士聚會，藉談宣傳問題……還做過演講和廣播；對教育界，主張反共教育但局勢已不容許多留，只有隨着大家在成都進發。到了成都……曾邀請文化界人士聚會……發表反共廣播。當時四川大部份失陷，因此我在廣播中提出人民的反共方法來。」（引自前書，四六頁）不久成都亦疏散，任副部長和胡容民等幾位同志從成都飛海口，轉乘輪船回到台北。

當宣傳部同仁商議分批撤離廣州時，我因人地熟悉，決定留守至最後。是年雙十國慶，各界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慶祝大會，我曾於事前商請幾家報紙出版慶祝國慶專刊，並協助大會籌備小組策劃於會後舉行民衆遊行。雖明知大勢已去，仍本着不可爲而爲的精神，盡一己應盡的責任。至十三日上午，軍方友好通知我要當日離開廣州，我乃和宣傳部最後留守的羅時暘、許祖惇兩同仁，於是日下午趕至白雲機場。飛機約在四時多起飛，升空未久，即聞地面有槍聲。事後獲知，匪軍前頭部隊，係於當晚進入廣州。惟大批部隊則於十五日進入。我們乘搭的中航班機，原定由廣州直飛台北，後因機件略有故障，且油料不足，臨時改在香港降落。是晚我們三人找遍了香港九龍十多家旅館，處處均告客滿，只好向友人的商店借住一宵，次日飛抵台北，與先來的同仁會合，共同工作。

八、積極展開新階段工作

宣傳部遷來台北，最初借用新公園內屬於台

灣廣播電台（中國廣播公司前身）的部份房舍。至十二月初，中央黨部各單位全部遷台，才集中在中山南路現址辦公。（此處原來稱爲「凱歌歸」，係軍方的招待所。）

當時大家雖然飽經滄桑憂患退到台灣，可是不氣餒悲觀，而是抱着雪恥復國的決心，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的氣概。宣傳部的同仁陸續歸隊遷入新址辦公不久，我們便積極準備開展新階段工作，其中一件大事是研訂三十九年度工作計劃。

在未擬訂工作計劃之前，我們先對台灣地區的文化、宣傳機構作普遍的調查、了解，並選擇規模較大的，與其負責人晤談，交換意見。（關於此事的進行，當時台灣省黨部宣傳處長鍾自若兄協助頗多。）經過兩週時間，曾先後訪晤與中央日報、新生報、中華日報、公論報、民族報、華報、中央通訊社、軍聞報、台灣通訊社、民權通訊社、台灣廣播電台、民本廣播電台、空軍廣播電台等負責人，聽取他們對於加強宣傳工作的意見。至於雜誌，則因數目太多，無法一一訪問，只選擇在台北出版而按期發行的二十餘家，分兩次舉行座談會。十多天的晤談中，他們對文化宣傳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見；其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公論報社長李萬居先生。他除了建議在文化方面要盡量消除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之外，並說明他是青年黨黨員，但他了解當前反共救國工作需要國民黨的堅強領導；所以公論報在報導和言論方面，一定遵照宣傳部的指示辦理。隨着李先生指定一位高級人員和我聯繫，希望宣傳部今後有指示可以寄給他。不過，我爲了尊重政黨體制，後來宣傳部有些對黨報或本黨幹部的文件，我沒有寄給他，只寫私人信函或以口頭交換意見的方式和他商談。

我們擬訂的工作計劃，在宣傳重點方面，共訂定了下面五項：(1)加強反共宣傳，抨擊共產邪

說謬論，透露清算、鬥爭、奴役、剝削，民衆的慘狀及蘇俄侵略中國的陰謀；(2)展開思想運動，重建主義信念，以達成黨員的心理建設和全民的精神動員；(3)促進本黨改造，以健全革命組織，重振革命精神，鞏固革命領導中心；(4)闡述國民革命與光復台灣史實、先民來台開拓建設事蹟，及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5)號召海內外同胞團結愛國，在政府領導下為維護民主自由生活推翻共產暴政而奮鬥。

工作項目方面，宣傳部三十九年度工作計劃中共列了下列幾項：

1. 中央宣傳委員會每兩週會議一次，商定宣傳要點分發各黨部、黨報及文化宣傳機構本黨主管同志。遇有特別重大事件，則舉行臨時會議，研商宣傳決策。

2. 編印宣傳導報，每月出版一次，以研究宣傳策略技術，提供宣傳資料為主。

3. 每兩週舉行新聞界座談會一次，分析新聞背景、研討言論方針。另每兩週舉行文化界座談會一次，研討推展思想運動有關事宜。

(4) 創辦定期刊，每月出版一期或兩期，作為本黨對外宣傳代表刊物。(名稱暫定為「改造」)。

(5) 編印三民主義叢書，以推展思想運動；編印反抗俄小冊，以揭發共匪暴政及蘇俄侵略陰謀。

(6) 輔導各廣播電台加強反共宣傳，並經常編撰對大陸民衆、義軍、及國際人士之廣播資料送由電台廣播。

(7) 邀約專家學者舉辦分區巡迴演講，內容以前述五項宣傳重點為中心。

(8) 輔導本黨直轄黨報改進內容及推廣發行。

(9) 重建本黨藝術宣傳(電影)機構，並聯繫民間電影事業機構。

(10) 協助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籌組各種專門性

團體。(如中國文藝協會即係依據此項計劃，由宣傳部第一處邀約各報副刊主編及作者兩度聚談後而發起籌組的，三十多年來，一直為我國文藝界的領導團體。又如三民主義學會，亦係由宣傳部協助羅剛教授等發起組織，惜後來會務無形停頓。)

當時因中樞遷台未久，中央政府和中央黨部的經費都相當拮据。宣傳部三十九年度的業務經費預算共為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其中六十六萬元用來補助四家直轄黨報，(香港時報三十六萬元，海口中央日報六萬元，中華日報及台北中央日報各十二萬元。)其餘各項計劃的經費合計只有五十四萬元。

在三十八年年底之前，宣傳部曾為處理兩家黨報的人事問題感到棘手。一件是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羣赴日本久假未歸，董事長梁寒操先生向宣傳部提出以張北海先生接任社長。另一件是中央日報因刊載一兩篇文稿引起中央民意代表的誤會，有幾十位本黨籍民意代表致函宣傳部轉呈總裁要求更換社長。當時程部長尚在美國，我們請陶副部長將這兩事報告總裁，總裁表示：此時、此地，人事以安定為宜。總裁作明確指示之後，這兩事方告一段落；中央日報社長不動，中華日報仍由副社長李冠禮先生代理社長職務，至三十九年始改組，由張道藩先生任董事長，連震東先生任社長。

九、總統復行視事

三十八年十一月月中旬，當西南戰事正劇烈的時候，總裁蔣公於十四日由台北飛重慶坐鎮指揮，並數度電請李代總統早日來渝，俾「政府及統帥部有所秉承」，但李代總統却於十一月二十日托言就醫，由南寧飛往香港。蔣總裁聞悉即請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諸先生於二十一日赴港慰問，並敦促其早日返國主政。但李代總統

仍無返國之意，且表示：決定赴美，一面療疾，一面接洽美援。

居、朱、洪、鄭四代表於二十五日飛返重慶，次日向國民黨中央常會報告此行經過。中常會復推朱家驊、洪蘭友兩先生再度飛港，代表中常會促李代總統速返中樞力疾視事。

十一月三十日蔣總裁於指導黨、政、軍幹部疏散及部署後飛成都；重慶於是日淪陷。十二月二日朱洪兩代表自香港回成都，蔣總裁得知李代總統絕無回國之意。行政院閣院長仍作最後努力，急電香港請李代總統回國主政，並在電文中聲明：「無論在職權、在能力，決不能擔負在元首出國之中樞軍政重責。」但李代總統仍由港飛美。

自十一月二十日李代總統飛香港後，重慶、成都、台北等地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民青兩黨領袖及各報刊的言論，都紛紛請求蔣總統早日復職，領導中央政府。宣傳部對於這事的態度極為審慎，但對於國民公意，應任由各報刊盡量自由表達。

我看到李代總統於十一月二十日離國赴港前在南寧發表的書面談話中有這樣的宣布：「中樞軍政事宜，已電閩錫山院長負責照常進行，總統府日常公務，則令由邱昌渭秘書長及劉士毅參軍長分別代為處理」；我曾針對着他這項宣布，就憲法的觀點，寫成「當前我國元首職權的行使問題」論文一篇，認為李代總統這樣決定，在憲政上將發生三項重大問題，無法解決而與憲法精神抵觸。繼就我國憲法的立法精神申論，蔣總統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並未解除其總統職位，僅由於特定事故，不能視事而由李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目前這種事故早已不存在，蔣總統隨時都可以行使元首職權；這與我國憲法精神是符合的。這篇論文原擬在中央日報發表，後來覺得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中央發言的份量太重，

遂改送中華日報，在報導李代總統自港起飛赴美新聞的同一天（十二月五日）刊出。

自李代總統宗仁赴美後，國內輿論及民意代表請蔣總統復職的呼籲更多。三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監察院復會於台北，曾先後兩電李代總統表明態度以安輿情。國民大會在台代表於二月一日聯合電請蔣總統繼續行使職權。行政院閣院長得悉李代總統胃病已痊，仍無歸期，於二月十三日以從政黨員身份向國民黨中央常會請辭院長職務。立法院第五會期於二月二十四日在台北開議，出席委員三百八十餘人聯名電請蔣總統「即日繼續視事行使總統職權」。蔣總統介公鑒於國家情

勢的迫切需要和國民公意的懇切請求，乃決定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

宣傳部爲了協助新聞界報導這件大事及籌劃三月二日蔣總統視事後的記者會，程部長兩位副部長、及各同仁於二月下旬忙了好幾天。因爲那時行政院新聞處也裁撤了，只餘幾位人員隨同來台，所以這些事全部都由宣傳部承辦。我於三月一日前一連三天分訪各報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負責人，和他們研商有關這事的新聞報導和言論、商定出席典禮及記者會的人選，並分送各單位一份資料。這資料的標題是：「蔣總統引退及復行視事之經過」，內容計分：引退原因、和談

孫文思想風靡全球

洪文山

西元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留

下「革命尚未成功」「和平、奮鬥、救中國」

等遺囑去世的近代中國救世之主孫中山，繼承法統的是他所創立的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行憲政府，不但奉行孫文的三民主義，成功地建立了復興基地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中共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廿七日也在孫文的故鄉廣東中山大學舉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討論會，提出七十二篇論文，在開會的紀念演講中，中山大學的陳錫祺教授還大胆地談到一九七三年台灣出版的「國父全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訂，把有關孫文著作的謬誤加以訂正並註記刊載論文的典據）（見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日

本朝日新聞報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歐洲奧地利薩爾斯堡大學與西德慕尼黑大學主辦第一屆歐洲孫逸仙博士討論會，中華民國應邀參加的史學家有黃季陸、李國耶、許智偉、劉岱四人，在美國、日本已有數百種介紹孫逸仙思想志業的書籍出版。

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五十六年的今天，能有如此衆多的崇拜他的中外人士，這說明了孫中山先生確是現代的偉人，推究其原因可約述爲以下數點：

第一：滿清政府昏庸無能，對外來的侵略，祇知割地求和，犧牲了無數中國人民，孫中山先生基於民族正義，不但恢復了漢民族的意識，更創造了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世界大同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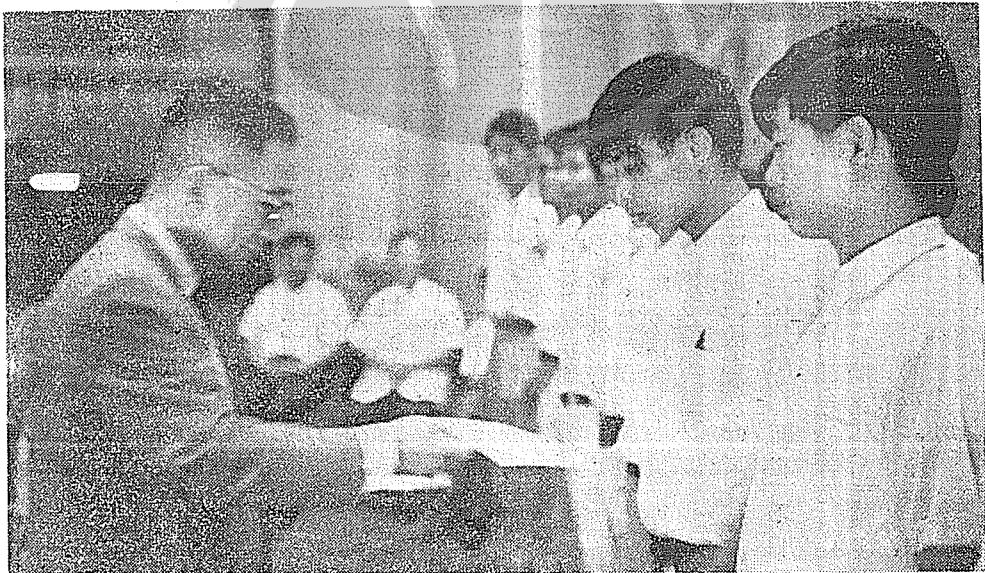
第二：推翻帝王專制，不做皇帝，發動革命只求共和民權，不像滿清消滅明朝，殺了一百萬以上的人民，孫中山先生祇以革命青年，不到一千人的生命，救了數億中國人民，創立民國，爲了國家統一，他表現了禪讓的美德，爲了避免南北戰爭，犧牲人民生命財產，他把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

孫中山先生爲了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提出民生主義、實業計劃，以求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成功地完成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實驗。總之孫中山的思想必將宏揚於世界，永垂不朽。

(頁二十九見文)圖插「年一的中浪駭濤驚在」哲希張



。影留時話講生學年青對州廣在授教哲希張年八十三國民



。影留時部幹隊作工年青給狀獎發頒授教哲希張